

美国政治极化的层次界定 与生成逻辑*

何晓跃

【内容提要】政治极化在当今美国政治中有持续增强趋势并深刻影响着美国的选举政治、国会运作和公共政策制定，同时对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亦存在颇多争议。美国的政治极化可分为政治精英和公众两个层面，两者的逻辑关联点是美国选举体制赖以存在的政治地理的区块划分，在总统大选中表现为以州为基本单位的选举人团体制，在国会选举中表现为以选区为基本单位的议席竞争体制。以此为基础，政党和公众作为双向施动者共同构建了美国政治极化的三个基础性生成机制和两个反向生成机制。虽然美国人口结构变化与限制政治献金的立法进展可能使美国政治生态在未来发生回调，但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公共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信息可选择性、社会运动的冲击、共和党安全选区的增加等因素使得美国政治极化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美国政治极化的持续，要求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应考虑美国国内政治特点，加强与美国民间的交流，并对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回归做好充分心理准备。

【关键词】政治极化 层次界定 生成逻辑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何晓跃，中共台州市黄岩区委党校助教

【中图分类号】D71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1-00103-18

* 感谢《国际展望》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存在的疏漏由笔者负责。

政治极化^①在当今美国政治中有持续增强趋势并深刻影响着美国的选举政治、国会运作和公共政策制定，这在政治学界已引起广泛关注。同时，关于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亦存在颇多争议，争议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关于政治极化的层次界定。政治极化可分为政治精英和公众两个层次，目前美国政治精英的极化是获得普遍承认与论证的事实，但公众中是否存在极化则没有统一的结论。二是关于政治极化中政治精英与公众之间的关联逻辑。目前美国的绝大部分政治精英（立法、行政、司法体系中的民意代表）是通过选举产生的，问题在于：如果公众的党派意识形态趋向极端（持自由派立场与保守派立场者居多数，中间派与温和派居少数），那么极化的选民基础通过选举体制产生极化的政治精英群体合乎逻辑；但如果公众整体并不存在极化，而事实上当前美国公众的党派意识形态也处于温和区间（下文中会对此进行论证），这就造成美国政治极化存在表征“矛盾”，即未极化的选民群体如何产生极化的政治精英群体，且极化的程度得以加强与延续？^② 本文拟在对美国政治极化进行层次界定的基础上，对其生成机制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分析，并探讨美国政治极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和启示。

一、美国政治极化的层次界定

层次界定的核心在于对美国政治精英与公众两个层次上是否存在政治极

^① 本文所指的“政治极化”以美国国内政治为概念界定范围，指的是美国政治精英（或普通选民）以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党派意识形态来引导自身政治参与行为并形成相应政治现象与结果的一种持续性过程。在当今美国国内政治中，政治极化突出表现为：以立法和政策制定为主要内容的国会运作中，国会议员比以往更经常出现一党的多数反对另一党的多数；以州和国会选区为基本地理空间单位的选举政治中，区域性选民较以往更具有倾向性的党派取向。

^② 根据“中间选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y)，在两党体制的政治竞选中，候选人若要赢得选举，其须获得大部分中间选民的支持，也就是其理念与政策须满足大部分中间选民的偏好。按照该理论的表述，未极化的选民基础不可能通过竞选体制产生在理念与政策方面持极化立场的民意代表。此理论最初由唐肯·布莱克(Duncan Black)在其论文“On the Rationale of Group Decision-making”中提出，后由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在其专著*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中深化。参见 Duncan Black, “On the Rationale of Group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6, No. 1, 1948, pp. 23-34;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al Action in a Democr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5, No. 2, 1957, pp. 135-150。

化现象作出判断。其中，政治精英的极化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证明，但公众中是否存在类似的极化现象则存在很大争议。就目前看，美国公众整体并未出现极化，但区域范围内其党派意识形态的同质性存在加强趋势。

（一）政治精英的党派意识形态趋向及其依据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美国政治精英在意识形态上由原来互有交集开始走向分裂，共和党内持中间、温和派立场的政治精英持续趋向保守派立场，而民主党内持中间、温和派立场的政治精英持续趋向自由派立场，这种趋势导致两党在国会中纷争不断。

第一，两党意识形态趋向的量化评估。一是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分裂日益扩大。美国政治学界主要用提名分（DW-NOMINATE Scores）^① 的绝对值差值作为衡量两党意识形态分裂间距的主要依据。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互有交集，中间及温和派议员在国会中视立法和政策本身进行投票，而非完全以党派划界。第 82 届国会（1951—1952 年）小于 0.05 的提名分差值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亦相符，但其后历届国会的提名分差值开始扩大特别是在 90 年代后的国会中被急速拉大，第 111 届国会（2009—2010 年）的提名分差值达到 0.26。二是两党内部意识形态的同质化逐步加强。衡量同质性的程度，美国政治学界主要用提名分的绝对值作为主要依据。2010 年时，美国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提名分绝对值分别为 0.91 和 0.92，民主党人分别为 0.97 和 0.93。^②

第二，两党意识形态极化的外在表现。意识形态的极化导致两党在国会运作中按党派划界，其主要表现是一党的多数反对另一党的多数。两党在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税率、财政赤字、外交政策等方面本有因历史因素形成的分歧，在极化背景下，其在立法和政策制定方面比以往更经常出现一党多

^① 提名分是美国政治学界用来衡量国会两党党内议员意识形态同质化程度及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分裂程度的主要指标，分值在-1 到 1 之间，分值绝对值越高，表示党派意识形态同质化的程度越高，提名分量化评估方法由美国学者凯斯·普尔（Keith T. Poole）和霍华德·罗森德尔（Howard Rosenthal）首创，参见 Keith T.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A Spatial Model for Legislative Roll Call Analysis," *Working Paper*, No. 5-83-84, Vote View, http://voteview.com/Upside_Down-A_Spatial_Model_for_Legislative_Roll_Call_Analysis_1983.pdf.

^② Royce Carroll, Jeff Lewis, James Lo, Nolan McCarty, Keith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DW-NOMINATE Scores With Bootstrapped Standard Errors," updated February 17, 2013, <http://voteview.com/dwnomin.htm>.

数反对另一党多数，奥巴马政府推动医疗改革方案在国会通过时无一共和党议员支持是最佳例证。衡量国会中一党多数反对另一党多数的趋向和程度可用党派团结投票分（Party Unity Scores）作为依据。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两党的党派团结投票分都比较低，但之后该数值逐步上升，到90年代后达到峰值：1970年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党派团结投票分为60%和56%，然而到1995、2001、2003三年均达到91%，其1970年在参议院的党派团结投票分为56%，但到2003年时达到94%；1970年和1972年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党派团结投票分均为58%，但到2007年和2008年均达到92%，其1968年在参议院的党派团结投票分为51%，但到1999年和2001年时均达到89%。^①国会中两党极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立法与政策制定的难度加大，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会共颁布立法828部，60年代为739部，70年代为618部，80年代为625部，90年代为472部，^②2000-2008年共颁布立法460部，^③立法数的减少从侧面反映出国会中两党极化现象的加强。

（二）公众党派意识形态趋向及其依据

就目前情况看，公众整体的党派意识形态处于温和区间但区域范围内的同质性在加强，总统大选中州党派倾向的红蓝分裂以及国会选举中竞争性选区数量的减少便是最好的佐证。

第一，公众整体的党派意识形态处于温和区间。根据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于1972—2010年期间关于公众党派意识形态自我界定的统计数据，自认为是温和派、轻微趋向自由主义者、轻微趋向保守主义者的选民比例变化微小，此三类选民比例之和一直占50%以上（表1）。同时，共和党选民阵营中持温和与自由派立场者占有较大比例，民主党选民阵营中持温和与保守派立场者占一半以上比例，而独立选民中持温和派立场者占主导地位。2000、2004、2008和2012年4个大选年中，共和党选民阵营中持温和与自由派立场者的比例之和分别为36%、34%、31%、31%，民主党选民阵营中持温和与保守派立场者的比例之和分别为65%、66%、62%、58%，而独

^①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December 15, 2008, pp. 3333-3334.

^② Norman Ornstein, *Vital Statistics on Congress: 2001-2002*, Washington: AEI Press, 2002, pp.146-149.

^③ "List of United States Federal Legislation, 2001-Present,"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United_States_federal_legislation,_2001-present.

立选民阵营中持温和派立场者比例分别为 45%、46%、45% 和 43%。^① 此外，公众中自认为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比例略有下降，而独立选民比例显著上升。从 1990 年到 2012 年（101—112 届国会期间），选民中自认为是共和党人的比例从 31% 下降到 24%，民主党人比例从 33% 降到 32%，而独立选民从 29% 上升到 38%。

表 1：美国选民党派意识形态区间分布表

比 例	极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	轻微自由主义	温和派立场	轻微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	极端保守主义
2010 年	3.9%	13.1%	11.8%	37.8%	13.4%	16%	4.1%
1972-2010 年平均值	2.7%	11.6%	13%	38.7%	16.1%	14.8%	3.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GSS website, <http://www3.norc.org/gss+website/>。

第二，公众区域性党派意识形态的同质性在加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州党派倾向的红蓝分裂在加剧。1992—2012 年的 6 次大选中，共和党胜率差值超过 20% 的州分别为 0、1、11、13、6 和 11 个，历次大选中最高胜率差值分别为 18.7%、21.1%、40.5%、45.5%、32%、48.1%；民主党胜率差值超过 20% 的州分别为 1、7、4、4、11 和 8 个，历次大选中最高胜率差值分别为 18.5%、33.4%、29.1%、25.1%、45.2%、42.7%；同时，历次大选中摇摆州数量呈减少趋势，分别为 9、8、7、7、5 和 4 个。^② 二是国会选区的同质化加强。在政治地理红蓝分裂程度加剧的情况下，单个州内的国会选区也因党派利益诉求基础上的重新划分，导致公众党派意识形态的同质化不断加强，安全议席不断增多，竞争性国会选区不断减少。在安全议席方面，共和党在职议员的安全议席平均比例由 1946—1964 年期间的 43.6% 上升到 1966

^① Andrew Kohut, "Trends in American Values:1987-2012,"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4, 2012, <http://www.people-press.org/files/legacy-pdf/06-04-12%20Values%20Release.pdf>.

^② 根据 1992-1996 年美国总统大选统计数据进行分析计算的结果，原始统计数据来源：“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elections.php>。

—2000年期间的71.3%。而在相应的时间段内，民主党在职议员的安全议席平均比例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在72.5%的基础上略升到73.2%；^①同时，公众区域性党派意识形态的同质化不仅表现在两党高比例的安全议席数，还表现在安全议席的持续性方面，如加州的第8国会选区自1949年以来一直为民主党控制，田纳西州的第2国会选区自1859年以来一直由共和党控制；在竞争性选区方面，2002—2008年期间的4次国会选举中，众议院435个议席中平均竞选胜率差值在20%以内的只有50个，平均竞选胜率差值在10%以内的只有9个。^②如2006年国会中期选举中，拥有54个众议院席位的加州只有第11选区发生党派互换，^③而且该选区是由原先的共和党控制转为民主党控制，这反过来进一步推进了加州公众的党派意识形态向民主党靠拢。

二、美国政治极化的生成机制

公众党派意识形态变迁与政治精英极化意识形态产生的逻辑关联点是美国选举体制赖以存在的政治地理的区块划分，在总统大选中表现为以州为基本单位的选举人团体制，在国会选举中表现为以选区为基本单位的议席竞争体制。以此为基础，政党和公众作为双向施动者共同构建了美国政治极化的三个基础性生成机制和两个反向生成机制。

（一）美国政治极化的基础性生成机制

第一，持续性的选民联盟重组与党派选择。选民联盟重组是指以关键性选举为依托的两党选民基础构成的根本性改变，即两党选民基础的构成群体中，特定群体整体性地放弃支持原有政党而转向支持另外一个政党；党派选择是指选民基于利益诉求基础上的、根据自身长期形成的党派认知而作出的党派取向选择。选民联盟重组与党派选择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在

^① 张业亮：《“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实？》，载《美国研究》2008年第3期，第24页。

^② Morris P. Fiorina and Samuel J. Abram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1, 2008, pp. 563-588.

^③ Robert S. Erikson, Gerald C. Wright and John P. McIver, “Public Opinion in the States: A Quarter Century of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Jeffrey E. Cohen ed., *Public Opinion in State Politics*, 2006,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29-253.

于两者都指特定选民群体在特定阶段所持党派立场的整体性改变，不同点在于党派选择也指特定选民群体对某一政党在支持程度上的加强，而前者不包含此内容。^①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基于选民联盟重组与党派选择机制上的两党选民基础结构的持续性变化，是美国政治极化产生的原始性动力。

1932年的关键性选举使非裔美国人的党派取向发生整体性的变化，由原先支持共和党转为支持民主党，此后民主党构成了以南方白人、知识分子、工会、天主教徒、犹太人、西部居民、非裔美国人为核心的新政选民联盟，美国南部自此成为民主党的稳固地盘，其在国会中的议席占比也由1928年的37.7%上升到1930年的49.6%再到1932年的71.9%。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不满民主党倡导的民权运动及相关政策，南方白人开始脱离民主党转而支持共和党，这标志着新政选民联盟开始解体，也导致两党的选民基础结构再次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自由派、中小企业、劳工、少数族裔、妇女和老幼等群体对民主党的支持程度不断加强^②，而保守派、大企业、大财团、宗教界、比较守旧的农村及持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白人等群体对共和党的支持程度不断加强。^③新政选民联盟解体对美国政治极化的产生有着重大影响，此后共和党在选举政治中便牢牢控制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大部分州及州下所辖的大部分国会选区，而民主党则牢牢控制美国东北部和西部沿海的所有州及州下所辖的大部分国会选区。

第二，人口选择性迁徙与选民党派意识形态重构。美国人口根据社会结构特征而进行的选择性迁徙，以及在此基础上发生的选民党派意识形态重构是美国政治极化的重要生成机制。选择性迁徙的直接结果是特定区域内人口在社会结构方面的趋同化，趋同化的人口社会结构更容易产生相似的党派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人口选择性迁徙与选民党派意识形态重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其一，以就业为导向的内陆到沿海迁徙与党派意识形态重构。该部分迁徙人群主要为受过良好教育并具备专业技能的年轻一代选民，迁徙方

^① Alan I. Abramowitz and Kyle L. Saunders, "Ideological Realignment in the U.S. Electorat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0, No. 3, 1998, pp. 634-652.

^② 何晓跃：《冷战后美国少数族裔在总统大选中的行为特征和影响力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8页。

^③ Lyle L. Saunders and Alan I. Abramowitz, "Ideological Realignment and Active Partisans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 32, No. 2, 2004, pp. 285-309.

向倾向从传统工业城市（主要集中在南部与中西部地区）到新兴都市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区域），该部分选民群体拥有良好的文化多样性包容力与对少数民族的容忍度，其在党派意识形态上趋近自由派立场，在党派选择中倾向民主党。其二，以族群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南北迁徙与党派意识形态重构。该部分迁徙人群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南部迁往东北部的非西裔白人，该部分选民在党派意识形态上往往比南方其他白人选民更靠拢自由派立场，对少数族裔更具包容力；另一部分是从东北部迁往南部的非西裔白人，该部分选民在党派意识形态上往往比北部其他选民更保守，持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对少数族裔的包容度并不高。以族群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南北迁徙导致南部居民的保守倾向进一步增强，其对党派意识形态同质化的影响要高于东北部。其三，以社区同质化为导向的选择性迁徙与党派取向重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社区的同质化程度亦不断加重，这表现为居民愿意选择与在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和从事的职业等方面和自己相近的人居住在一起。社区关系在个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孩童到成人，所接触到的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和宗教组织对于政治行为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中高收入群体所在社区的政治生态系统能给其成员塑造一种观念，即政府对他所在群体的政治意愿给予关注并能进行及时的信息反馈。相反，在低收入群体所在的社区中，诸如犯罪、社区秩序和精神秩序的紊乱、健康医疗问题、高昂的房贷利率、失业、过早地辍学、家庭的破裂及居住地点的不稳定等各方面的负面因素，使得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及以后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容易形成消极的观念。^① 社区同质化的加强势必使同一社区内居民的党派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相互靠近。

第三，选民代际更换与区域性党派取向趋同。选民代际更换是指年轻选民群体代替年老选民群体的自然延续性过程，由于不同代际选民政治社会化的整体环境有着很大不同，那么其形成的党派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亦有很大差别。选民代际更换会加强政治极化的基础是新一代选民在党派意识形态上

^① Robert J. Sampson, "How Do Communities Undergird or Undermine Human Development? Relevant Contexts and Social Mechanisms," in Alan Booth and Ann C. Crouter eds., *Does it Take a Village? Community Effects o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Families*,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2001, pp. 3-30.

极易形成整体性倾向，这在新政选民联盟形成时就有过明显体现。在新政选民联盟形成之前，1905年前出生的白人选民与1910年后出生的白人选民是当时的两个主要代际选民群体，后者由于不满共和党在大萧条中的作为表现，在1932年大选中整体脱离共和党转向支持民主党，这也是此后民主党能稳固南方各州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情况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①

当前美国“千禧一代”（the Millennial Generation，是指出生于1978年到2000年期间的美国人）已成为选民的主力之一，2008年该群体中合法选民占全体合法选民的23%，预计到2020年该比例会上升到39%。^②由于美国当前极化的政治地理始于20世纪60年代，千禧一代政治社会化的环境大多处于有明显政治立场倾向的州和国会选区中，同时由于千禧一代选民并未经历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选民联盟发生重大重组的选举政治环境，其党派意识形态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生后的成长环境，这就造成一种显而易见的结果：在共和党所控制的州和国会选区内成长起来的千禧一代选民往往支持共和党，其党派意识形态趋向保守派；而在民主党所控制的州和国会选区内成长起来的千禧一代选民往往支持民主党，其党派意识形态趋向自由派。以加州为例，虽然自新政选民联盟解体之后，该州一直是最稳固的蓝色州之一，其选民党派意识形态趋向自由派立场。但在1977年，该州支持同性婚姻的选民比例不到30%，而到2003年这个比例上升到42%，到2008年则上升到51%。该州支持同性婚姻的选民比例大幅度上升的原因之一是州内选民的代际更换，千禧一代选民较之于老年选民在党派意识形态上更加趋近自由派立场，2008年时州内18—29岁之间选民中赞成同性婚姻的占68%，反对的占25%，较之于年轻选民，65岁以上选民中赞成同性婚姻的比例为55%，反对的比例为35%。^③因而，在选民出现代际更换的情况下，特定州和国会选区内选民的党派取向必将进一步趋同。

（二）美国政治极化的反向生成机制

^① Saunders and Abramowitz, “Ideological Realignment and Active Partisans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pp. 285-309.

^② Ruy Teixeira, *Demographic Change and the Future of the Parties*, Washington: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2010, p. 19.

^③ Alan I. Abramowitz and Kyle L. Saunders, “Is Polarization a Myth?”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0, No. 2, April 2008, pp. 542-555.

第一，政党竞选体制运作重点变化对选民传统党派意识形态的反加强。在现代美国竞选体制中，理性的竞选候选人有两个关注重点，一个是竞选资金的来源，另一个是竞选策略的运用。在竞选资金的来源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党的控制权从政党领导人手中慢慢转到政治活动委员会和利益集团手中，特别是能为竞选候选人提供竞选资金的群体。同时，政党活动者常常联合与候选人立场不一致的议员给候选人施压，这导致候选人为了巩固该类群体的支持，在相关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政治立场以取悦此类群体选民。如2008年的政党提名竞争中，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共和党党内活动者及院外活动者的影响下，不得不放弃早期持有的与前总统里根立场一致的综合性移民改革方案，采取了对非法移民而言条件苛刻的改革方案。在这一竞选环境下，竞选候选人在政策宣传上难以对本党以往的政策重点进行较大改变与突破，由于新的政策不能惠及更广泛的选民群体，候选人除了继续赢得传统拥护本党的利益集团、特定选民群体的支持外，不可能使其他选民群体发生党派立场的改变，这就反过来加强了选民党派意识形态的稳固性。

在竞选策略方面，由于两党在总统大选和国会选举中都牢牢地控制着一些州和国会选区，两党都视在一些州争取选民的支持是浪费资源的行为，在总统大选和国会选举中通常放弃反对党牢牢控制的州和国会选区。2012 大选中，民主党放弃南部和中西部的多个州，共和党也放弃西部沿海和东北部沿海的多个州。由于缺乏党派竞争，相应州与国会选区的选民根本不可能改变党派立场，这也反过来造成了美国政治地理红蓝分裂的加剧。

第二，不公正重划选区对选民党派选择的干扰和压制。不公正重划选区是指特定州的在职国会议员为维持或加强自身所属党派的优势，人为地对新增选区的地理形状进行强制限定，以达到本党控制新增选区的效果。不公正重划选区一方面造成特定国会选区内选民党派意识形态同质化的增强，另一方面造成特定州客观真实的选民党派取向不能得到反映。以得克萨斯州为例，该州目前共有38个国会选区，其中共和党控制26个，民主党控制12个，民主党所控制国会选区数量比例为31.6%，但这与该州真实的选民党派取向并不相符。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后，得州非西裔白人占该州总人口的45.3%，西裔占37.6%，非裔占11.8%，亚裔占3.8%，其他族裔占1.5%，少数族裔人口

占该州总人口的 54.7%。^① 如果仅从人口结构的角度分析，得州因有过半少数民族裔人口的存在，而少数民族裔目前是民主党的核心选民基础之一，其党派取向若得到真实反映的话，那么民主党所控制的国会选区数量应多于目前实际拥有的数目。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得州共和党在职议员利用其在州内立法机构的党派优势，绕过《选举权法》重新划分选区而巩固自身的选区优势。

三、美国政治极化的表征层次矛盾与逻辑关联

政治精英和公众作为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行为主体，两者之间存在一个表征矛盾，即美国公众的整体党派意识形态并不存在极化，两党的政治极化是如何产生并得以延续的？根据“中间选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y)，在两党体制的政治竞选中，候选人若要赢得选举，须获得大部分中间选民的支持，也就是其理念与政策须满足大部分中间选民的偏好。按照该理论的表述，未极化的选民基础不可能通过竞选体制产生在理念与政策方面持极化立场的民意代表，这与美国选举政治的实际并不相符，这就要求厘清美国政治极化中政治精英与公众之间的逻辑关联。

(一) 美国政治极化中政治精英与公众的逻辑关联

目前关于美国政治精英与普通选民之间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出自美国政治学界，相关研究认为：美国两党极化政治生成的原始动力在于增强党派影响力，政治极化得以延续与强化，依赖于美国以州和国会选区为地理空间单位的选举体制，这也是美国政治极化行为主体层次间的逻辑关联点。对于如何增强党派影响力，“有限制的政党政府”理论(Conditional Party Government Theory)认为，政党影响力的强弱依赖于党内成员意识形态的同质化及在立法与政策制定方面的立场一致化程度。就美国政治精英来讲，两党内部的政治极化现象一旦形成，共和党与民主党各自内部的意识形态将分别更趋极端，两党在选举、立法和政策制定各环节中以党派划线的程度将不断强化并得以持续。^② 对于政治极化得以延续与加强的内在机理，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① “Demographics of Texas,”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Texas.

^② Jason M. Roberts, “Minority Rights and Majority Power: Conditional Party Government and

第一，在两党能取得力量均衡且在两党都有可能胜出的竞选体制中，共和党或民主党赢得选举的关键在于满足党派意识形态较为极化的较少部分选民的政策偏好，以赢取该部分选民的高比例支持，而不在于满足党派意识形态较温和的大部分中间选民的政策偏好。^① 特别是对于共和党而言，维系和巩固福音派和基要派^② 等虔诚宗教信仰者以及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等选民群体的支持，是其候选人在总统选举和国会竞选中胜出的重要因素。该选民群体具有浓厚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色彩，这成为共和党议员党派意识形态日趋偏右的重要原因，也为两党政治极化的加剧提供了选民基础。

第二，选民通过长期的党派选择（Party Sorting）过程形成比较稳定的政治立场和具有区域倾向性的党派意识形态，随着美国政治地理红蓝分裂的加剧与国会安全议席的增加，两党所控制选区内选民党派意识形态的同质化程度进一步增强。在此环境下，在相应的州与国会选区内，两党候选人取胜的关键在于赢得现有支持选民的继续支持而不必取悦温和派的立场选民。因此，持极端立场的候选人反而容易赢得压倒性优势胜出，而持中间与温和派立场的候选人反而被选民抛弃，这就从选举体制的具体运作方面指出了美国政治极化得以产生并能延续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③

第三，由于美国选举体制下竞选过程的持续时间冗长，这会极大增加选民的参与成本（时间、精力、金钱）等，参与成本的持续增加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较大部分中间选民在竞选的最后阶段放弃参与投票，这使持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政治立场的选民比例大大增加；二是最后去参与投票的中间选民的政治立场发生分化，该群体中的一部分选民趋向自由派或保守派政治立场。^④ 这就从参与成本角度说明了美国政治极化产生的可能性。

the Motion to Recommit in the House,”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May 2005, pp. 219-233.

^① Samuel Hunting,, “A Revised Theory of American Party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4, 1950, pp. 669-677.

^② “基督新教”是由 16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会和基督徒形成的一系列新宗派的统称，简称新教。“福音派”和“基要派”是基督新教的两个派别分支，福音派与基要派的主要区别在于：基要派恪守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福音派也恪守传统教义，但比基要派更愿听取不同方面的观点。

^③ Thomas M. Carsey and Geoffrey C. Layman, “Changing Sides or Changing Minds?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Policy Preferences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0, pp. 464-477.

^④ Morris P. Fiorina and Samuel J. Abram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二）美国政治极化持续存在的潜在动摇因素

在美国政治极化的生成机制中，政党和公众都是施动者，两者共同维系了政治极化的发生与发展。政治极化能否长期持续决定于双向互动机制能否延续。就短期来看，政治精英是美国政治极化生成机制的主要驱动者，但从长期来看，选民是该机制的主要驱动者。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美国政治极化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两党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特别是国会运作中）能够取得循环性的力量均衡，其中最重要的是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多席位由两党轮流控制，而这种力量均衡产生的基础是两党均能维系特定州和国会选区的选民忠诚。就目前来讲，以下因素的存在可能打破美国政治极化的持续存在：

一是美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其中最重要的趋势是少数族裔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这势必造成美国未来的选民结构将出现重大调整。特别是由于美国南部地区拥有大量少数族裔人口且该地区的人口增长主要由少数族裔拉动，那么未来南部相关的州和国会选区或许会转向支持民主党，如此两党在政治运作中取得循环性力量均衡的基础将被打破，美国政治极化得以存在的延续机制也将不复存在。就全国地域分布来说，少数族裔人口分布最集中的是美国南部，其次是美国西部。1990年西裔在西部和南部的分布比例分别为45.2%和30.3%，2000年分别为43.5%和32.8%；1990年亚裔在西部和南部的分布比例分别为55.7%和15.4%，2000年分别为48.8%和18.8%；^①1990年非裔在南部、东北部和中西部的比例依次为52.8%、18.7%和19.1%，2000年分别为54.8%、17.6%和18.8%。^②近年来西裔、非裔和亚裔在西部的分布比例都有所降低，而在南部都有所上升。由于一个州在众议院的议席数是由该州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决定，这个比例越高，该州拥有的众议院席位就越多，选举人票数也越多。西裔、非裔和亚裔的人口增长使得少数族裔较为集中的南部和西部各州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这就意味着南部和西部各州众议院席位和选举人票数的增加。^③由于少数族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1, 2008, pp. 563-588.

^① U.S. Census Bureau, *th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1*, No. 31, p. 31; *Th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1*, No. 22, p. 24.

^② *Ibid.*

^③ 何晓跃：《冷战后美国少数族裔在总统大选中的行为特征和影响力研究》，第25页。

裔是民主党的核心选民基础之一，共和党在短期内能利用选区重划的方式对少数族裔的党派选择进行压制，但从长远看是不能持续的。

二是美国限制选举政治献金的相关立法进展。限制政治献金的最主要目的在于约束利益集团对于选举政治的影响力，由于大公司、大财团、军工复合体是共和党的主要支持者，放开选举献金限制有利于共和党，反之则有利于民主党。同时，由于利益集团是导致共和党政治精英党派意识形态日趋保守的重要原因，因而美国如果在限制选举政治献金的立法方面取得进展，将去除美国政治极化产生的一个重要基础。美国政府关于限制政治献金的立法始于1907年，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推动国会通过了《提尔曼法》，该法案禁止公司出于政治目的提供竞选资金。此后，相关法案陆续出台以完善和规范选举筹款和开支的使用。2002年，国会通过《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案》，该法案对“软钱”政治献金的使用作了严格限制。但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了一项有关政治献金的法律裁定，废除了大公司、工会、政治团体和非营利团体在总统选举以及国会议员选举中对候选人所提供竞选经费的上限，此举为利益集团积极介入竞选活动重新打开了方便之门。相比于民主党，共和党更能享有此项法律裁定带来的裨益。美国能否通过立法手段对政治献金进行有效限制，是影响美国政治极化能否持续存在的重要因素。

四、美国政治极化的发展方向分析

从政党和公众互动的实际情况看，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公共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信息可选择性、社会运动的冲击、共和党安全选区的增加等因素，使得美国政治极化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一）经济不平等加剧

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产生与贫富差距的扩大关系密切，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收入和财富正聚集在有政治影响力的阶层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这在财富分配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占人口总数1%的最富有群体占国民收入的16.9%，占国民总财富的34.3%；与此相对应的是，占总人口90%的群体占国民收入的57.5%，只占国民财富的

28.7%。^① 经济不平等与政治极化的关联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从公众层面讲，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在党派取向上本是泾渭分明，前者多属于共和党阵营，后者多属于民主党阵营。由于民主党主要代表自由派、中小企业、劳工、少数族裔、妇女和老幼等群体的选民利益，而共和党主要代表保守派、大企业、大财团、宗教界和比较守旧的农村等群体的选民利益，这使民主党政府比共和党政府更能响应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税收等方面的利益诉求。^② 在政治极化加深的背景下，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党派立场发生整体性改变的情况比以前变得更不可能。从政党层面讲，政策制定者和竞选人在政党立场与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对中高收入群体的意愿更加重视，对低收入群体意愿的关注度不断下降。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尽管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在扩大，但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减少这种经济不平等及保护低收入家庭免受经济衰退的侵蚀。议员在制定政策时表现出来的立场经常性地与议员所在选区的大众利益脱钩，而更倾向于遵从所在政党的立场并按照委托人的意愿来投票。政府在决策时更多地考虑高收入群体、商业利益集团和特定区域的利益，而对低收入群体的意愿却考虑得越来越少。共和党愈益转向右翼立场，是因为这种立场的受益者能够利用其经济权力为政治家提供竞选资金和某种安全网。显然，基于经济利益诉求基础上的选民党派选择和政党的政策选择，为政治极化的持续存在提供了坚实基础。

（二）公共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信息可选择性

公共媒介主体的增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共信息的可选择性，是当代美国政治极化产生的重要原因。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电视、报纸数量很少，而且在相关规定的制约下，媒体对于事件的报道基本上符合客观事实，具有主观性意见的评论相对较少。随着电视、报纸数量的增加，新闻报道也慢慢变得具有主观性，以此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这从某种程度上加固了美国公众的党派偏好。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普及，为极端政治立

^① Lawrence Mishel, Jared Bernstein, and Sylvia Allegretto,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2006/2007*, Ithaca, NY: ILR Press, 2007, p.10.

^② 何晓跃：《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对大选政治的影响》，载《国际论坛》2011年第5期，第71页。

场的蔓延和扩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用。一方面，像谷歌、脸谱等网站通过技术手段对信息进行过滤，根据用户的浏览偏好提供相应信息。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给消费者提供了过滤信息的便利，网上信息的高度可选择余地，使得许多互联网用户只寻找自己所关心的信息，与政治偏好相近的人进行交流，网络巴尔干化（Cyberbalkanization）的加强使得极端政治立场容易形成并得到强化。^①

（三）全球化浪潮下社会运动的冲击

典型案例是 2009 年的茶党运动和 2011 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茶党运动反对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医疗改革方案，主张政府要缩小规模、缩减开支、降低税收、弱化监管；“占领华尔街”的意图是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可归于民粹主义运动，两者是左翼和右翼的关系，其斗争反映了美国历史上“反对大公司还是反对大政府”的传统争论。“茶党”和历史上的其他右翼运动一样，主张反对“大政府”，强调政府权力的膨胀必然会降低个人的自由和活力，而左翼则主张反对“大公司”，推动政府采取一些限制垄断、保障民权的措施，例如 20 世纪初的“反托拉斯法”、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等等，对美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全球化浪潮下的社会运动扩大了公众的党派分野。

（四）共和党安全选区的增加为其继续右转提供了选举基础

美国国会选区在 2010 年人口普查后进行重新划分，由于选举人票数增加的州多为倾向支持共和党的州，而选举人票减少的州多为倾向支持民主党的州，且共和党可以单边决定的选区数量远超民主党单边可以决定的选区数量，因而共和党在此次选区重划中获得优势地位。同时，共和党为了扩大选区优势，采取了一些肆意妄为的措施。目前，绝大多数州都是由州议会来负责选区重划，为了维护选区划分的公正性和增加透明度，有些州成立了无党派倾向性的独立选区划分委员会，并把选区重划的任务从原来的州议会选区重划委员会转交给该委员会。然而亚利桑那州在该州州长推动下，共和党人成功

^① 杨悦：《美国众议院选区重划：2012 年奥巴马连任的拦路虎？》，载《当代世界》2012 年第 2 期，第 66 页。

地弹劾了该州独立选区划分委员会主席。由于美国选举体制以州和选区作为基本单位是美国政治极化产生的地理基础，共和党安全选区的增加无疑给政治极化的继续存在添加了砝码。^①

除以上四个因素外，导致美国政治极化短时间内难以消除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选举政治的表面民主与实质专制之间的关系。即选民只在选举投票时有民主，在选举之后便无法规制官员的投票行为，使得极化无法得到有效遏制；议员只需要在备选阶段使选民相信其声称的理念，而无须在当选后实际兑现其承诺。

五、美国政治极化对中美关系的启示

美国政治极化对处理中美关系有三点重要启示：

启示一：处理中美关系应考虑美国国内政治特点。在政党政治的极化程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总统、两党、国会以及社会舆论基于利益多元化、权利争夺、党派偏见等因素，对于中美关系会表达出不同态度和声音，因而中国在思考美国如何制定对华政策以及中国在制定对美政策时，一定要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特点，对于美国政府、国会议员或主流媒体基于国内政治利益需要而发出的反华或有悖于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言论应理性看待。

启示二：应加强与美国民间的交流。就美国国内的角度而言，中美关系的维系与发展须处理好两大维度：一个是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这条线；二是中国政府、民间与美国民间这条线，包括与美国公众、主流媒体及一些有影响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目前美国公众的党派意识形态在整体上不存在极化现象，大部分公众还是以客观态度评价中美关系的。根据盖洛普的调查数据，美国成年人和意见领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差别并不大，认为“紧密的中美关系”对美国有益的分别为 81%和 88%，认为“中美关系是友好的”分别为 63%和 69%，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美国有益”的分别为 45%和 61%。^②

^① 同上，第 65-66 页。

^② 数据来源于盖洛普（GALLUP）官方网站，参见“Americans, Opinion Leaders See U.S.-China Ties as Friendly,” Gallup, February 14, 2012, <http://www.gallup.com/poll/152618/Americans-Opinion-Leaders-China-Ties-Friendly.aspx>; “Americans See Benefits of Close U.S.-China Relations”, Gallup, April 17, 2012, <http://www.gallup.com/poll/153911/Americans->

在当前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下，增强两国民众的交流对改善美国对华的战略认知、增强中美互信是大有裨益的。

启示三：须对新保守主义势力^①重新逆转做好心理准备。美国政治极化的持续存在给新保守主义势力的逆转提供了可能。新保守主义势力对于国际合作、国际法、军备控制与裁军持消极态度，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倚重硬实力实现国家利益，尤为热衷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虽然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活动空间在奥巴马政府任期内得到一定的抑制，但新保守主义势力在美国国内仍具有深厚的基础。一方面，奥巴马团队内仍有不少与新保守主义势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物担任要职，只是其表现方式比以前变得更加隐蔽；另一方面，美国的大公司和大财团、军工复合体、宗教保守势力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支持者，这三股势力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一直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在国内经济不景气、政党极化程度加深、区域范围内选民党派意识的同质化程度加强的情况下，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活动空间获得巨大转圜，典型案例是小布什在2004年大选中放弃了争取中间选民的竞选策略，直接依靠宗教保守派赢得选举。同时，新保守主义势力在传统观念上主张“遏制”中国，加上其负面的国际安全理念，如果新保守主义势力实现逆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不利的。

[收稿日期：2013-07-23]

[修回日期：2013-12-25]

[责任编辑：张 春]

Benefits-Close-China-Relations.aspx。

^① 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典型代表是以里根总统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其对美国优越论和民主的力量以及选举、言论自由和市场经济等美国的价值观笃信不疑，主张使用硬（军事）实力来促进这些价值观，对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作用持怀疑态度。